

男性氣質與台灣後殖民小說中的慾望經濟學

謝世宗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邱貴芬的〈性別／權力／殖民論述：鄉土文學中的去勢男人〉一文在後殖民的脈絡中，指向了女性主義的男性研究的可能性。本文延續此一脈絡，藉由西方男性研究，尤其是對男性氣質的討論，進一步深化邱貴芬的後殖民女性主義，也希望為男性研究與台灣文學批評的結合做出初步的貢獻。正文的第一部分將蕭規曹隨地闡釋邱貴芬所提及的殖民主義與性別論述的權力關係：殖民者往往將被殖民者女性化，並借此合理化自己對異己——異地與異性——的侵占。第二部分則以黃春明的〈莎喲娜拉·再見〉為例，探討男性角色在殖民主義侵略與國族主義抗爭中的曖昧態度。最後則延伸第二部分所建構的理論框架，閱讀幾部台灣戰後的後殖民文本，包含王禎和的《美人圖》、黃春明的〈小寡婦〉、李永平的《海東青：台北的一則寓言》中〈一爐春火〉一章，以探討男性氣質在殖民情境所可能遭受的挫敗和創傷與後殖民抵禦中所流露的男性暴力與性別歧視。最後，本文認為如果被殖民者亦步亦趨地複製殖民者的暴力模式，則掌握權力的被殖民者同樣無法避免以暴治暴所帶來的人性挫傷，因此去殖民的過程與去除男性氣質中的暴力層面必須同時並進，不可偏廢。

關鍵詞：後殖民、男性氣質、男性研究、台灣小說、慾望、性別

Masculinity and the Economy of Desire in Some Postcolonial Fiction from Taiwan

Elliott S.T. Shie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Chiu Kuei-fen's essay "Gender/Power/Postcolonial Discourse"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of impotent male characters in postwar Taiwanese literature, opening the possibility of male studies in the field of postcolonial feminism. Following her argument, this essay combines the study of masculinity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to explore the economy of desire in some postcolonial novels from Taiwan. The first section of the essay articulates the conspiracy of colonial discourse and gender hierarchy: the colonizer often effeminates the colonized, thereby justifying the subjection of the other sex and the other people to colonial domination. By reading Huang Chunming's "Sayonara, Goodbye!", this essay then focuses on the homosocial relationship of 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 that is, a sense of brotherhood in the face of women as desirable objects. The final section develops this concept and discusses how the colonized men suffer symbolic castration in Wang Zhenhe's *Portraits of Beauties*, how postcolonial struggles may unwisely duplicate the violent nature of colonial masculinity in Li Yongping's "A Pot of Spring Fire" and how colonial men are tormented by their guilty consciousness for doing violence to the colonized and innocent in Huang Chunming's "Little Willows". The conclusion argues that the process of decolonization would run the risk of duplicating the violence of colonialism if the culture of masculinity inherent in nationalist struggles is not taken into serious consideration.

Keywords: postcolonialism, masculinity, male studies, desire, gender,
Taiwanese novels

男性氣質與台灣後殖民小說中的慾望經濟學

一、導論：後殖民理論與男性研究

邱貴芬的〈性別／權力／殖民論述：鄉土文學中的去勢男人〉（1993）一文，最初發表於一場「台灣女性文學」研討會，可以說是後殖民女性主義理論的最佳實踐範例之一。¹此文探討了台灣鄉土文學中的經典作品，包含王禎和的《玫瑰玫瑰我愛你》（1984）、黃春明的〈莎喲娜拉·再見〉（1973）、陳映真的〈夜行貨車〉（1978）中去勢的男性角色，與台灣百年來殖民史的關聯。如同邱貴芬其他後殖民評論的文章（像是〈「發現台灣」：建構台灣的後殖民論述〉）²，性別一直是她關注的焦點，而在此一討論男性角色的文章中，不但再一次證實了性別在後殖民論述中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男性議題在女性主義理論中曖昧不明的地位。正如她自己所說，這樣一篇研究男性作家筆下男性角色的文章，放在「當代台灣女性文學研討會」中，「似乎頗有答非所問，供不合需的嫌疑」；然而，「『男性』或『女性』並不取決於生理構造，一個具有男人生理構造的人可能佔有女性定位，扮演女性角色」。³台灣作家筆下的男人，正是「在殖民架構中喪失男性地位，甚至在面對殖民者時，不自覺地扮演女性角色，淪為被嫖、被剝削的台奴，在殖民經濟架構裡像傳統女性般地被物化為交易商品」。⁴這些男性角色因此不像男人，而像女人，所以放在女性文學的研討會中來討論應有其合理性；此一論文最終討論的畢竟還是「女性」，而非「男性」。

1 邱貴芬，《仲介台灣·女人：後殖民女性主義觀點的台灣閱讀》（台北：元尊文化企業公司，1997.09），頁178-200。

2 同註1，頁153-177。

3 同註1，頁179。

4 同註1，頁180-181。

當一個社會中多數的作家是男性，大多數作品的主角也是男性時，以男性學者為主的研討會，所關注的焦點自不免是男性角色。針對這樣的男性霸權，以女性學者為主的女性文學研討會，提供了一個反霸權的政治空間，使女性作家與文學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有一個發聲的機會與管道。男人既然佔據了大半的學術論述空間，此時以「男性」為焦點的討論仍在此地大聲嚷嚷、引人注意，則未免顯得有些不識相。或許因為如此，男性議題一直不受到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正視；當女性主義者批評了傳統經典（大多由男性作家所書寫）中負面的女性呈現、挖掘了受到忽視的女性作品與女性傳統、並探索了另類的女性美學或女性書寫的可能性時，性別研究的領域仍然是專注在女性與女性議題，而關於「男『性』」（male sexuality）或「男性氣質」（masculinity）的討論仍然付之闕如。這種情況在美國的學界，根據Susan Jeffords的說法，至少要到1980年後才有改變。⁵ 當許多女性主義學者仍然著重女性問題，如女性勞動力、性自主、生育權等議題時，有越來越多女性主義者了解到：假如男人和女人都是經由性別機制而建構的，要是此一互相建構的複雜關係沒有被充分理解，那麼許多影響女性的議題也不可能完全釐清。不論是為了解男人或是為了解女人，而不得不去了解男人，有越來越多的女性主義者，運用其女性主義理論的洞見，進行男性研究與男性相關議題的討論，如Susan Bordo的《曖昧地帶：文化影像的隱匿生命從柏拉圖到O.J.》（*Twilight Zones: The Hidden Life of Cultural Images from Plato to O.J.*）與《男性身體：重審公領域與私領域的男人》（*The Male Body: A New Look at Men in Public and in Private*）都是深具洞察力的作品，不但幫助女人了解男人，也幫助男人了解自己。⁶

邱貴芬的〈性別／權力／殖民論述：鄉土文學中的去勢男人〉在後殖

5 Susan Jeffords, "The Big Switch: Hollywood Masculinity in the Nineties," in *Film Theory Goes to the Movies*, ed. Jim Collins, Hilary Radner, and Ava Preacher Collins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 196.

6 Susan Bordo, *Twilight Zones: The Hidden Life of Cultural Images from Plato to O.J.*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The Male Body: A New Look at Men in Public and in Privat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9).

民的脈絡中，指向了女性主義中男性研究的可能性。本文延續此一脈絡，藉由西方男性研究，尤其是對男性氣質的討論，進一步深化與複雜化邱貴芬的後殖民女性主義，也希望為男性研究與台灣文學批評的結合做出初步的貢獻。正文的第一部分將蕭規曹隨地闡釋邱貴芬所提及的殖民主義與性別論述的權力關係：殖民者往往將被殖民者女性化，並借此合理化自己對異己——異地與異性——的侵占。第二部分則以黃春明的〈莎喲娜拉·再見〉為例，探討作家如何經由筆下的男性角色，反思在殖民主義侵略與國族主義抗爭之外，男性同性情誼的曖昧。延伸第二部分所建構的理論框架，本文將集中討論幾部台灣戰後的後殖民文本，包含王禎和的《美人圖》（1982）、黃春明的〈小寡婦〉（1975）、李永平的《海東青：台北的一則寓言》（1992）中〈一爐春火〉一章，以探討男性氣質在殖民情境所可能遭受的挫敗和創傷，以及後殖民抵禦中所流露的男性暴力與性別歧視。結論則綜合討論男性氣質與殖民／後殖民論述的關係，以期能將近年來的男性研究成果導入後殖民文學批評。

二、女性「化」主義

殖民論述將被殖民男性「女性化」的現象幾乎是不分中西、普世皆同的，但由於不同的歷史、政治與文化的中介而有不同的呈現。Louis Montrose 分析 16 世紀的英國殖民論述時，特別討論了 Sir. Walter Raleigh 將迦納比為處女地（*virgin land*）的例子。他認為藉由一種轉喻式（*metonymic*）的修辭，土地的比喻不但取代了活生生的住民，而且土地本身進一步被性別化為宛若處子的女性身體，隱晦或抹去了美洲原住民男人的存在。如此一來，英國人占領迦納的意圖便像男性意圖征服女性一樣理所當然；性別階層（*gender hierarchy*）的意識形態合法化了英國人想要侵占新世界女體的集體欲望。⁷ 處女地的比喻在殖民論述中源遠流長，而在後來

7 Louis Montrose, "The Work of Gender in the Discourse of Discovery," *Representation* 33 (Winter 1991), p. 12.

更與英國資本主義發展與海外市場擴展的合理化程序密不可分。例如洛克（John Locke）研擬了一套所有權的勞力理論，認為能在土地上創造最大交換價值者，便擁有土地的所有權，以此合理化英國移民對殖民地的侵佔與統治。⁸ 處女地的比喻在此又增加了「生產」（production）的意涵：殖民地彷彿是荒地，必須等待英國科技與文明來轉化。文化（culture）一詞在字源上本與植物的栽培（cultivation）與居住地或殖民地（colony）有關，⁹ 而使荒地成為富有生產力的良田便成為由蠻荒進入文明的表徵。間接地，美洲的原住民男性一個個成了沒有生產力的怠惰者，也成了象徵上的性無能者——他們無法在土地上生產作物，正如同他們無力使原住民女性懷孕（否則她們又如何能夠保持處女之身，而被用於處女地的隱喻？）。¹⁰ 這樣的處女地論述當然與事實不符，美洲原住民自有其歷史、風俗與文明，他們在白人所表現出來的怠惰，也許只是不同工作倫理的展現——不同於英國人的工作倫理，意圖在有限時間、原料或土地，經由理性化的方式，創造最大價值。然而重要的是，在「處女地」的論述下，原住民男性都遭受到象徵性的閹割，個個成了性無能者；而唯有英國人可以使土地／女性受孕生產，使其進入文明的狀態。

回到台灣的殖民史脈絡，Emma Teng 指出在清朝的文人遊記中，台灣常常是以女人國的形象出現，不只是因為從楚辭到唐詩的中國古典文學傳統，都將北方與男性氣質、南方與女性氣質相聯結，更是因為某些台灣原住民的母系社會成了漢人眼中的異端。相對於傳統儒家的重男輕女，這些原住民部族重女輕男；相對於漢人社會以男性為一家之主，母系社會中的女性才是土地財產的合法繼承人——這些差異往往成為漢人眼中原住民未開

8 Ellen Meiksins Wood, *Capital of Empire* (London: Verso, 2005), pp. 96-97.

9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rev.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77.

10 Anne McClintock, *Imperial Leather: Rac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Colonial Contest*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30.

化的表徵。¹¹ 清朝的漢人同樣將台灣／土地／殖民地女性化，只是並非使用處女地的隱喻，而是類似亞馬遜女人國的原型；對台灣的探索與征服也並沒有和男性刺穿或占領女性身體相對等。¹² 這或許是因為清朝文人多數是像郁永河的遊客，而非如 Sir. Walter Raleigh 作為專業的探險家與帝國擴張的斥候，後者便曾極力勸進英國女皇取下迦納。然而清朝文人對台灣原住民女性的偷窺狂、慾望的投射與女性身體的物化，都與英國殖民者的帝國主義眼光（imperial gaze）是有許多類似之處；而因為在漢人的眼中，母系部族的原住民男性似乎地位低下，有如漢人社會中的妻子角色，所以原住民男性在清朝文人遊記中常常被女性化，尤其是沒有鬍鬚的原住民男人甚至被認為是天生的太監。¹³

然而不管是女人國或處女地，都不再適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想像。一方面，至 19 世紀末，台灣已經是一個漢化十分嚴重的社會，原住民的母系社會體系相對而言不是主要的社會結構；另一方面，在日本殖民前台灣已經是清朝的屬地，日本人作為繼任的統治者，自然無法將台灣想像為未開發的處女地。殖民時期的電影《大佛的瞳孔》可以作為日本如何想像台灣（女人）的例子。日本政府在 1920 年代決定利用電影散播日本文化並加強殖民統治，故在 1922 年在台拍攝了第一部劇情片《大佛的瞳孔》，敘述某中國大官威脅一名台灣女子嫁給他，一個日本青年前來搶救，而在危急之際，大佛的瞳孔忽然發出光芒把大官嚇跑。¹⁴ 從殖民論述的脈絡來推敲，電影中的台灣女子成了台灣的隱喻，而中國大官成了清朝政府的代表；而清朝的腐敗表現在其罔顧法律上，並以中國大官依賴其權勢脅迫平民女子就範，反襯出

11 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76-180.

12 同註 11，p. 174.

13 同註 11，p. 180.

14 《大佛的瞳孔》的情節摘要見陳儒修著，羅頗誠譯，《台灣新電影的歷史文化經驗》（台北：萬象圖書公司，1994），頁 26。

日本政府的紀律與法治。¹⁵ 另一方面，中國與台灣的关系在電影中是以強迫性的婚姻來呈現，是一個不愉快的短暫結合，而日本成了中台不幸婚姻的解救者。其中大佛瞳孔所放射的光芒，幫助完成了日本青年的救援行動，代表神明終將站在正義的一方。在以上的救援故事中，台灣被轉喻為必須受保護的女性，台灣男人的缺席暗示著台灣（男）人無能自己保護台灣（女人），所以必須依賴外來的保護者（日本男人）。

救援故事在殖民論述中並不陌生，如英國對印度的殖民論述便在性別之外加上了種族的層次，展演出白人（英國男人）拯救黃人（印度女人）的意識形態情節。印度傳統中妻子以身殉夫的行為，在英國人眼中如同謀殺，純然是男性父權制度壓迫女人的機制，而完全忽略了此一看似不人道的儀式在傳統脈絡中可能具有的不同意義，如「宗教烈士」（religious martyrdom）或「尚武的英雄主義」（warlike heroism）。視印度女性為印度父權體制的受害者至少有兩個功用：一方面強化了英國人統治印度的合法性——文明人道的英國理應統治野蠻落後的印度；一方面英國人自我形塑為女性救援者，不論是表現在1829年的立法廢除殉夫的行為，或是在小說中（如英國女性小說家Flora Annie Steel的《水面之上》（*On the Face of the Waters*）的救難英雄角色，在千鈞一髮之際救出即將被火刑殉夫的印度女子。¹⁶ 援用歐洲中世紀以降的騎士精神理論，英國人對女性的尊重成為男性氣質的重要表徵，而相對地，印度男人對其同種女性的暴力，不管是在個人或制度層面，便是缺乏文明、缺乏騎士精神的證明，更是男子性匱乏（deficiency of

15 日本人治理殖民地的法治精神似乎一直存在於某些日本人的殖民想像中，如小林善紀的《台灣論》寫道：「清朝的官吏貪污與瀆職的嚴重情況，一如過去所有支那大陸上所出現過的王朝」（頁123），而「日本人來到台灣之後，社會治安立時大為改善，衛生條件亦大幅提升。而且一切行為開始有法可循」（頁127）。至於日本出兵支那，小林認為蔣介石與毛澤東都是獨裁政權，日本的統治反而能給支那人民更大的幸福；換言之，日本的殖民主義反倒是站在「公」益的一方。至於台灣男人在日本入主台灣後所組織的反抗軍，小林則視之為「在地的流氓或幫派」，似乎也呼應台灣男人無法自治的形象（頁90）。小林善紀的台灣史論述在許多方面呼應《大佛的瞳孔》對殖民者、女性與被殖民男性的再現模式。小林善紀著，賴青松、蕭志強譯，《台灣論：新傲骨精神》（台北：前衛出版社，2001.02）。

16 Revathi Krishnaswamy, *Effeminism: The Economy of Colonial Desir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pp. 85-86, 92-93.

manhood) 的癥候。¹⁷ 在英國的殖民論述下，印度男人不如他的英國對應者一樣是完全的男人，而是在其男性氣質中混合了女子性 (femininity-in-masculinity)，並且比純然的女子性更加病態、更加危險。¹⁸

在上述殖民論述中，在地男人的形象在不同的社會、文化、歷史脈絡下有不同的呈現，樣貌包含性無能或不具生育力、附屬於女人並有女性化傾向、缺乏能力保護當地女性、公共領域的無能者與家庭私領域的施暴者等等。然而在殖民主義者的眼中，被殖民男性均具有女性化的病態傾向，而此一修辭 Revathi Krishnaswamy 稱之為殖民論述中的「女性化主義」(effeminism)。¹⁹ 人類學家 David Gilmore 認為幾乎所有的文化都為男性設立了一個想像的理想角色，而背離者此一典型者則被貼上「陰柔的」(effeminate)、「娘娘腔」(emasculated)、「不像男子漢」(unmanly) 等負面標籤；當女性氣質多半被認為是與生俱來，男人的資格 (manhood) 則必須是經由努力而贏得的。²⁰ 因此在從屬社會中，男性本身就時時懷著「不像男人」的焦慮，而外來的殖民論述更以其「女性化主義」的修辭，否認或閹割了被殖民男性的男性氣質。只要被殖民男人仍然自我認定為國族的一員，不論是否親身經歷殖民主義，「女性化」的陰霾將亦步亦趨籠罩著被／後殖民男人。

在殖民論述中，被殖民者沒有能力參與書寫、再現自我，而僅能消極地被再現為女性化的男人；而當後殖民時刻來臨，被殖民男性取得權力「逆寫」帝國的論述，則他們又如何想像男性自我、殖民者與本土女人的三角關係？不同的作品提出了不同的回答，例如李小龍《猛龍過江》中的主角，以武力打退美國黑幫，保護移民的中國女子，重新肯定了被殖民男人的男性氣質。在《精武門》中，中國男性被日本人視為東亞病夫，而主角則以武力

17 同註 16，p. 17.

18 同註 16，pp. 18-19.

19 同註 16，p. 20.

20 David D. Gilmore, *Manhood in the Making: Cultural Concepts of Masculin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1, 19.

劈斷「東亞病夫」的匾額與打敗日本功夫高手來重建中國人的男性氣質。²¹當殖民主義的「女性化主義」建立在殖民男人等於真男人、被殖民男人等於女性化的假男人的二元對立時，李小龍打（東）洋鬼子的故事，反轉但又複製了殖民者的性別論述，強化男性作為女性保護者的意識形態，以及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去殖民邏輯。然而好的文學作品不只有好的寫作技巧，更在於它能直探人性的幽微、曖昧與矛盾處，故本文選擇黃春明的〈莎喲娜拉·再見〉為下一節的討論焦點，不但因其涉及了台灣男人、本土妓女與日本嫖客（殖民者）的三角關係，避免了過度簡化的二元對立，也使我們了解反殖民論述中男性氣質、性別政治、經濟階級與國族主義縱橫交織的權力網絡。

三、壓迫的多重面向：性、階級與殖民

〈莎喲娜拉·再見〉敘述主角黃君帶領7名日商到家鄉礁溪嫖妓的心理掙扎與挫敗，最後在火車上的一場翻譯對話中，教訓了一名崇日的台灣學生，並使日本嫖客意識到自己殖民者的醜態與暴力。²²邱貴芬認為故事不斷強調7名日本嫖客的男性位置，點出殖民行為隱含的性別架構，而被殖民男人黃君在「殖民壓迫結構裡喪失權力，眼睜睜看著自己國家的土地、女人任殖民者揮刀直入」後，恐怕「在『失勢』之後，唯有『去勢』的命運」。²³這樣的解讀方向並無錯誤，只是如果我們深入故事情節的肌理，我們會發現台灣男人、日本嫖客與本土女性的複雜三角關係鑲嵌在一組三元變因中，亦即國族、階級與性別，遠比殖民與被殖民的二元對立關係複雜。

首先，國族的對立與矛盾是故事的中心主題。故事中的7名日本商人，組成「千人斬俱樂部」，自命為七武士，以「一生能和一千個不同的女人睡覺」為目的，輾轉發揚日本武士道精神。而黃君作為一個民族主義者，面

21 Jachinson Chan, *Chinese American Masculinities from Fu Manchu to Bruce Lee*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 78-80.

22 黃春明，〈莎喲娜拉·再見〉，《莎喲娜拉·再見》（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1985）。以下隨文標示頁碼。

23 邱貴芬，《仲介台灣·女人：後殖民女性主義觀點的台灣閱讀》，頁187-188。

對不得不執行的拉皮條工作，特別感到矛盾與恥辱，尤其是他曾在同事面前「極端民族主義地臭罵過日本人」，現在卻「將要唯唯諾諾地帶7個日本人，去嫖我們的女同胞」（頁18）。在黃君的理解中，日本人是不折不扣的敵人或他者（other），不但曾經折斷了他祖父的右腿，而且是南京大屠殺的兇手，尤其後一事件隨著國民黨大中國民族主義教育的洗禮下，在黃君心中埋下仇視日本人的種子（頁18）。而日本人將要去嫖的妓女，在黃君的國族想像中，被剝去了獨特而具體的社會身份，簡化為國族想像中的「女同胞」；換言之，妓女成了女性，而身為男性的國族主義者，因為無法保護其國族中的女人而感到羞辱，就如同中國男人無法保護中國女人免於南京大屠殺，無法保護孕婦免於被刺刀刺進肚子或母親抱著孩子被活埋的情境一樣（頁18）。身為男人卻無法為女性提供保護，黃君的男性氣質不免受挫，而成為被（象徵性地）閹割的男人。

在國族主義的想像中，漢賊不兩立的意識形態，是激起國族主義或去殖民運動的利器，然而階級因素的導入干擾了此一二元對立的模式。首先，日商與黃君的公司具有合作而非對立的關係，而真正有直接剝削關係的是黃君的上司與黃君之間。換言之，台灣的本土企業為了在國際資本主義的市場上生存或競爭，不得不與日本商人或公司合作；除非台灣拒絕參與國際市場，如同古巴一樣，否則台灣企業與東亞的重要經濟體日本必然要維持貿易伙伴的關係，而非如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敵我對立、水火不容。因此在商言商，國族間的矛盾必須被暫時擱置。再者，除了黃君的國族意識所造成的矛盾與痛苦，他真正受到的是階級的壓迫與經濟的壓力：身為下屬，他不得不執行上司所交代下來的「公事」；而雖然在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中，他有辭職的自由，但是經濟壓力排除了此一選擇——他來台北10年，這是唯一一份工作，使他的家庭生活得以安定下來。在封建社會中，貴族以武力剝削下層階級的勞力，在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下，生活所需成為市場動力，逼迫無產階級進行勞動與生產。黃君所受到的壓迫並非直接來自殖民者，而是無形的經濟壓力：公司所要討好的對象被作者設定為日本人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如二次戰後的美日聯合陣線對抗共產國家的冷戰架構），也因此有文學反應現實的合理性，但比較精確地說，是階級剝削逼迫他從事拉皮條的工作，

而非殖民者的直接暴力。

其次，妓女在國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下成了抽象的「女同胞」，而在稍後的情節中恢復其獨特身份；妓女，亦即資本主義市場交換體制下的無產階級勞工與供應男人消費的商品，此一身份並不必然與殖民主義有關，也不必然可以象徵被殖民者的普遍情境。正如賀安慰所質疑的，黃春明似乎「將男女之間的性剝削轉嫁到國際政治的層次，而將探討自己同胞嫖妓問題留給讀者去納悶」。²⁴ 在經濟壓力下，她們不得不從事性工作，而不論台灣男人或日本人都是消費者或購買者——他們的國籍在資本主義的商品交換機制下並不重要。反倒是從經濟的角度切入，讀者必須面對另一個矛盾：妓女因為收費因人而異不同，歡迎日本人勝過本地人。就勞資公平的觀點來看，妓女提供同樣的服務，卻只能從台灣人哪兒得到較少的薪資，這種同工不同酬的狀況是否表示台灣人對妓女的勞力剝削比日本人更加嚴重？再說，雖然黃君身為皮條客，似乎是日本殖民主義的幫兇，但就純粹經濟的觀點來看，黃君是一位稱職的仲介——原本四百的消費價格，他為妓女爭取到一千元。如果在一般的認知中，皮條客與嫖客同樣是妓女身體的剝削者，這裡黃君是妓女的優良合作伙伴；他彷彿是個稱職的房屋仲介，為委託賣屋的客戶爭取了最高的銷售價格。最後黃君與妓女同屬經濟體系中的弱勢，也因此黃君對弱勢族群間產生同情（尤其是臉上有缺陷、又自卑的阿珍），也超越了經濟上的合伙或剝削關係。

在國族與階級之外，男性情慾的存在進一步複雜化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二元對立。當黃君為日本人安排好性交易後，自己拒絕任何小姐作陪，回到自己的房間躺下：

翻個身轉個角度，我看到掛在壁上的一張洋妞的裸體照；她跨坐一張翻過來的椅子，雙手放在椅背下，下巴就托在那裡，像在等的作態。看了它，整個思路的方向馬上被扭轉到這方面來。我想那幾個日本

24 賀安慰，《台灣當代短篇小說中的女性描寫》（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01），頁13。

人，他媽的，正是天昏地暗的時候。那印度神油的效果到底是怎麼樣呢？剛才要不是認識玉梅的媽媽，說不定阿珍已經是在身邊吧。男人經常說，醜女九風騷，像她有那麼大的自卑，我又表示對她好，我深信她一定會對我很好的。他媽的，現在她不知道在做什麼？但是不管慾念怎麼沖昏了頭，還是有清醒的部分。這份清醒，使我不敢面對自己。（頁64）

黃君接著走到餐廳，將自己灌醉，獨自渡過一夜。如同邱貴芬所說的，黃君深受慾念的煎熬，卻不得不壓抑自己的慾望，以表示與殖民者有別。²⁵就黃君而言，日本人是國族想像中的對立他者，黃君恨之入骨；在經濟上日本人卻是合作伙伴，黃君不得不妥協；然而在性別上，不管願不願意，黃君與日本嫖客站在同一男人陣線。首先，他們同樣表現出「跨種族的性幻想」（*interracial fantasy*）：日本人刻意來到台灣買春，正因為台灣女人有著日本女性沒有的異國情調；同樣地，黃君房間裡的洋妞裸體照，正表徵了台灣男人對異族的性幻想。其次，黃君與日本男人同樣表現了一種「假陽具艷羨」（*dildo envy*）。弗洛伊德認為女人本質上是被閹割的男性，因此潛意識中有所謂的陽具艷羨（*penis envy*），但女同性戀理論家 Pat Califia 則認為男人在潛意識中同樣有艷羨的對象，但非陽具，而是「假陽具」（*dildo*）。因為真陽具，有如「硬殼裡的軟蝸牛」，即使在勃起堅挺的時候，仍然無法排除軟弱下垂的最終命運以及伴隨而來的焦慮；而假陽具因為從來沒有軟弱的時刻，便成了男性艷羨的最終對象。²⁶所以，在上面的引文中，黃君雖然拒絕嫖妓，但是仍然好奇印度神油的效果；而日本人馬場對黃君則有「（年輕）陽具艷羨」的情結，他說：「黃君還年紀輕，不像我們，他可以不必用（印度神油）」（頁56）。日本人作為殖民者在此並非強而有力的形象出現，反倒是因為年紀而面臨無法「硬起來」的焦慮；他們面對年輕的黃君，反而自覺（至少在性能力上）低人一等，因為即使有印度神油加

25 邱貴芬，《仲介台灣·女人：後殖民女性主義觀點的台灣閱讀》，頁188。

26 Susan Bordo, *The Male Body: A New Look at Men in Public and in Private*, p. 48.

持，效果也有時間性的限制，也難怪馬場在解釋完印度神油的功效後，笑容變得慘淡，毫無喜悅之情（頁57）。

Krishnaswamy的後殖民研究特別指出，即使自我與他者的二元對立是殖民主義與反殖民鬥爭的共同模式，但在殖民男性與被殖民男性之間卻常有一種曖昧的「殖民同性情誼」（colonial homosociality）。²⁷ 在黃春明的故事中，殖民者日本嫖客與被殖民者黃君，同樣表現出跨種族性幻想，同樣具有男性潛意識的假陽具艷羨；他們儘管在其他方面是敵對或妥協的關係，在男性情慾上卻具有某種程度的彼此認同。與日本男人一樣，女人同樣是黃君的慾望客體，但是黃君又不願「跟日本人一起幹這種事」（頁56）；藉由拒絕召妓，黃君拒絕或否認自己與日本人有相同之處。矛盾的是，黃君越拒絕越是凸顯了自己與殖民者並無不同；他們同為男人，同樣具有男人的慾望，如果黃君身為日本人，有何保證他不會做出相同的事？

作者戲謔地稱7名日本嫖客為「七武士」，將「陽具」等同於「刀」，成為日本人對台灣經濟殖民的表徵。然而當黃君在火車上，以日本侵華的歷史使日本嫖客意識到自己殖民者的暴力時，日本嫖客依然感到罪惡與痛苦。此時，日本嫖客與台灣妓女的關係便不僅止於象徵意義上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而是牽涉到殖民暴力、心理創傷與象徵替代（symbolic substitute）的心理層面。7名日本嫖客都曾參加過侵華戰爭，也曾是帝國主義的施暴者，其中的佐佐木特別感受到戰爭的創傷，他「很痛苦的叫了一聲：『我們看到南京大屠殺的場面，看到黃浦江的浮屍，看到大轟炸，看到……』（頁78）。而黃君自然知道，戰爭的罪惡感，已經使「他們昨夜買來的歡樂，恐怕所剩無幾了」（頁78）。現今仍有日本人認為侵華戰爭是不得不進行的聖戰，然而故事中的日本人則為罪惡感與戰爭的心理創傷所苦，並且將他們的「陽具」（刀）進行象徵性的自我閹割——他們不再趾高氣揚，而是垂頭喪氣。「陽具」（刀）正是殖民暴力的來源之一，它所造成的罪惡卻成為施暴者生命中不能承受的重量。

27 Revathi Krishnaswamy, *Effeminism: The Economy of Colonial Desire*, pp. 47-52.

或許更使7名日本人覺得痛苦的是，以陽具或刀刺穿女體的男性慾望並沒有隨殖民主義消失而消失，而只是以陽具象徵地置換（displace）了刀槍。雖說他們是「七武士」，是「千人斬俱樂部」的成員，但以真實的刀子刺穿女體畢竟不同於以陽具刺入女陰，後者並不會真正造成如黃君所說的：「我今天不帶他們7個日本人去，別人會帶他們去。照樣有7個女同胞被殺」（頁21），反倒是今天7名被嫖的妓女，明天仍然可以照樣接客。正因為嫖妓不會造成物理上的後果，嫖妓便成為日本人內心（男性）殖民慾望的象徵性替代或昇華管道，有如一個人以屠夫為業，昇華並替代性地滿足他屠殺生靈的慾望（宰殺牲畜畢竟是為社會所認可的行為）。²⁸ 故事中的黃君揭露此一「置換」或「昇華」的心理機制，指出軍事入侵與暴力殖民、來台嫖妓與刺入女陰、現今殺人不見血的經濟殖民，三者具有同樣的暴力本質，並藉著罪惡感「閹割」了殖民者的男性慾望。

從國族、階級與男性情慾三個層面，來探討台灣男人、日本嫖客與本土女性的三角關係時，我們看到的不只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敵對關係：在國族想像或階級關係上，日本嫖客與黃君是有敵對或緊張關係，但在男性情慾上，雙方卻有對彼此的認同。或許黃春明想說「男人就是男人」，不論階級、種族、國籍，都是同一副德行。日本嫖客與台灣妓女，在國族想像上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在資本主義體系下是消費者與販售者的關係；在性的層次，嫖客是慾望主體，妓女是被慾望的客體。在三個層次同時作用下，我們得到的是一加一大於二的關係：陽具刺入女體成了殖民主義入侵殖民地的替代性滿足；而殖民暴力所帶給殖民者的心理創傷，閹割了7名嫖客，因為刺入女陰的暴力也許與暴力殖民有程度上的差異，但本質上並無太大的不同。

28 Ann Freud 定義「昇華」為本能目標的置換（displacement of instinctual aim），其慾望的目標物必須符合社會價值，亦即可以為社會所容許，因此此一自我防衛機制（mechanism of defense）亦即隱含了對超我（superego）的接受。換言之，黃春明故事中的7名日本嫖客並非完全的邪惡角色，他們至少保有些許的良知，足以為日軍屠殺中國百姓的行為而產生罪惡感。見 Ann Freud, *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se*, trans. Cecil Baine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INC., 1946), p. 56.

四、男性氣質的多重面向：挫敗、暴力與創傷

在Gerard Genette的理解中，任何一個文本並不單獨存在，而是存在於一個與其他文本互涉的關係網絡中，此即他所謂的「跨文本的互涉性」（*transtextuality*）。²⁹ 本節將要討論的文本，包含王禎和的《美人圖》、黃春明的〈小寡婦〉、李永平的《海東青》中〈一爐春火〉一章，均對於〈莎喲娜拉·再見〉中的情節與主題或呼應、或補充、或演繹，不但表現了Genette所謂的文本互涉（或說「互文」）的性質，更重要的是幫助我們得以進一步深化前一節對後殖民與男性氣質的討論。

《美人圖》第一部中的男主角小郭在旅行社工作，正如〈莎喲娜拉·再見〉中的黃君，他的公事之一是帶日本人到北投去嫖妓；小郭帶去的日本人同樣不是年輕人，而是「六點半的」老阿本仔。³⁰ 如同黃君為妓女爭取最大利潤但回扣則分文不取，小郭也視日本人為「不搾白不搾」的凱子，甚至以其三寸不爛之舌，說服日本客人接受一個祖母級的妓女（頁27）。不同於黃君作為一個民族主義者，面對不得不執行的拉皮條工作，特別感到矛盾與恥辱，小郭的心中唯有純粹的經濟考量，再加上對社會弱勢者（妓女）的同情。黃君與小郭同樣認為這些女性都是為生活所迫而從娼，情有可原。但在《美人圖》中，北投的妓女並非以無能的受害者形象出現；她們的主體性與能動性（*agency*）來自於其專業，其中又以那位祖母級的妓女為最：她「不但一口流利的日語，而且還會唱日本歌，又會跪榻榻米，行九十度鞠躬大禮，那幾個日本鬼子統給她阿諾轟——阿諾轟——迷得團團轉」（頁28）。在此，日本嫖客與妓女並非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而是近似於消費者與生產者——妓女不只提供身體作為商品，還提供軟性服務；由於其專業，而非面貌，這位祖母級妓女的坐枱費是其他年輕小姐的5倍（頁28）。

儘管日本嫖客與台灣妓女不見得都是用來象徵殖民與被殖民者的關係，

29 Gerard Genette, *Palimpsests: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Degree*, trans Channa Newman and Claude Doubinsk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p. 1.

30 王禎和，《美人圖》（台北：洪範書店，1982），頁23。以下隨文標示頁碼。

但小郭的確扮演了被嫖的女性角色，並閹割了自己的男性雄風。故事一開始即不斷強調小郭的男性氣質：他經常敞開襯衫的三四顆扣子，露出一片胸毛；他也喜歡全裸入睡，其「暴升起來」的陽具，總是使在旁的室友小林覺得尷尬（頁21）。然而面對有斷袖之癖的日本遊客，小郭以一根1千元的價格，讓他拔了5根陰毛，呼應〈莎啞娜拉·再見〉中的日本嫖客在買春後，必將妓女的一根陰毛貼在其備忘錄裡的情節——如邱貴芬所說，備忘錄有如一部殖民史，「每一頁上的女人陰毛代表一次成功的殖民行為」。³¹ 面對同性戀上司，小郭同樣為了3萬元，讓他的上司「搞得我（小郭）痔瘡都出血了，他還消遣我說：『小郭，你落紅了喲！』」（頁71）。小郭的陽具不但在同性關係中無用武之地，還扮演類似「處女」般被動的、被「刺穿」的角色。若說小郭處在一種被經濟殖民的狀態，則殖民者不必然是外來者，也可以是台灣人自己；換言之，身體與金錢的剝削並不必然攸關國族對立，階級剝削才是最終的關鍵。

小郭面對金錢的誘惑而自我閹割，並遭受到男性氣質的挫敗，因此近似於妓女的角色。然而王禎和所要批評的真正妓女並非上述為生活而從娼的女子，而是故事中「貞節狐」所代表的典型。貞節狐是一個有夫之婦，卻可以為了購買外國奢侈品，而隨意與同事或上司發生關係；同樣地，小郭也盲目追逐西方流行，為了購買奢侈品（如車子）而出賣自己的身體。³² 〈莎啞娜拉·再見〉以外國嫖客來台買春作為經濟殖民的隱喻，但從沒有明確的描寫經濟殖民究竟以何種形式進行。王禎和的《美人圖》從經濟的角度切入，則明確地討論到消費主義與文化殖民的問題：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的風行下，人們唯利是圖，不擇手段，生活的目的在消費奢侈品；另一方面，台灣人崇洋媚外，以美國的商品作為流行與現代性的標的。在美國帝國主義文化的殖

31 邱貴芬，《仲介台灣·女人：後殖民女性主義觀點的台灣閱讀》，頁186。

32 儘管小郭的崇美是負面的品質，鄭恆雄也正確地指出：「小郭是介乎純然崇洋文化和道地本土文化之間的中間人物。他既追求時髦的洋文化，但是也還有本土的人情味。……他出賣肉體為了買車而賺到兩萬五千元，全數拿給小林應急幫助二兄娶妻」。鄭恆雄，〈外來語／文化「逼死」（VS.〔對抗〕）本土語言／文化——解讀王禎和的《美人圖》〉，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5.07），頁296。

民下，台灣人以美國為現代性的指標與思維的參照標的，以美國人的生活方式、語言、消費行為為模仿對象，台灣人如小郭與貞節狐因此毫無主體性可言。³³ 當小說中消費主義與文化殖民是一而二、二而一時，本土男人小郭因此遭受到階級與文化殖民的雙重閹割。

黃春明〈小寡婦〉的寫作時間略晚於〈莎喲娜拉·再見〉，表面上似乎也在探討殖民者（美國）與被殖民者（台灣）的關係，但這個故事的真正主題有二：一、本土企業在全球化下的發展；二、反越戰。³⁴ 第一部分描述留美回國的馬行善如何將傳統產業（妓院）進行企業化的革新，準備「海削」到越南打仗而在台灣度假的美軍。產業革新的內容除了酒吧的重新裝潢、妓女的談吐訓練、現代化的廣告行銷外，還包括建立酒吧的獨特性，以求在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的激烈競爭下突圍——「小寡婦」的妓女，不只是要和台北、台中、高雄的同行競爭，還要與「琉球、日本、香港等別的休假中心」一起爭取客人（頁116）。發展地方特殊性便成了逐鹿全球的不二法門，酒吧不但改名叫「小寡婦」，其中的小姐還必須完全是「清宮秘史」或「民初」的中國式打扮（頁109）。透過自我東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創造異國情調，這看似荒謬卻又真實無比的情境，豈不是和當今旅遊業拼觀光的手段一模一樣？而馬行善的經營理念的確發揮功效，例如美軍路易就想：「越南的、琉球的、韓國的統統經驗過了。不過她們的打扮都是十分入時」，因此開始留意妓女阿美胸前的「中國綢緞的圖案和質地，那種東方古老的神秘感，無意間從心底升起迷惑，幻想著透過那一層古老的圖案的皮膚，一種異趣香味，也同時泛散出來」（頁151）。對於老經驗的國際客戶路易來說，形象（衣服）可以創造「神秘感」以轉化真實（皮膚），畢竟「幻想」而非肉體才是啟動情慾的開關。

小說第二部分的重點是反戰，延續了〈莎喲娜拉·再見〉中戰爭的心

33 對於美國帝國主義文化對台灣人思維模式的殖民，見陳光興，《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台北：行人出版社，2006.10），頁278-81。

34 黃春明，〈小寡婦〉，《莎喲娜拉·再見》。以下隨文標示頁碼。

理創傷與男性自我閹割的主題。〈莎喲娜拉·再見〉中的日本人因為黃君提及侵華戰爭的往事，使他們前夜的歡愉煙消雲散，路易則在戰場上看見「光裸下體的女屍」以及「那腐爛的洞窟的一簇蛆蟲」而就此不舉（頁153）。在西貢的酒吧，他買了一個妓女，卻在緊要關頭，回想起那女屍，以及自己莫名其妙地扣了扳機，將那女屍的下半截打成碎屑的情境。就在這時刻，路易「自己一向頗具信心的陽物，竟龜縮得像一顆蟲蛹」（頁155）。路易是身經百戰的老兵，不可能沒見過屍體，而究竟為什麼這具女屍「閹割」了他的陽具，故事本身並沒有說明。從心理分析的角度切入，或許我們可以說路易在蛆蟲身上看到了自己陽具的影子——自己的男性暴力（經由武器）正是製造屍體的根源，而他的嫖妓行為，如同〈莎喲娜拉·再見〉中的千人斬買春團，隱含了以暴力刺穿女體的慾望。暴力所造成的後果折磨著路易的良心，因此他將女屍的下半截打成碎屑的無意識行為，正是以暴力否定暴力的惡性循環。女屍解體但影像卻深入路易的潛意識。由於嫖妓與殺人隱含了相同的暴力本質，所以當嫖妓時，女屍的鬼魂便被召喚而幽幽出現。如果以暴力壓抑的方式不奏效，他的陽具選擇退化到原始的純真狀態，「縮得像一顆蟲蛹」。再一次，陽具與（蛆）蟲相類比，只是此次是「蟲蛹」，象徵男性成人變成嬰兒、回到子宮的原初狀態。根據Ann Freud的說法，在超我（*superego*）的規範下，人類的原始本能（*instinct*）成了危險或不道德的，此時自我必須啟動防衛機制以面對過強的道德焦慮。³⁵在心智上退化到幼年時期，亦即心理學家稱之為「退化」（*digression*）的現象，即是防衛機制的一種，藉以逃避現實，躲避超我所造成的焦慮的方法。陽具的萎縮或許在路易身上正是一種「退化」的自我防衛機制；它退回到男性暴力尚未萌芽的原始狀態，以否認暴力本能（*instinct*）的存在，以及暴力帶來的道德譴責以及超我（*superego*）所造成的焦慮。

男性的性慾當然不必然與暴力畫上等號，對女性的慾望也不必然含有「刺穿」、「侵犯」、「控制」、「佔有」的成分。如Timothy Beneke所

35 Ann Freud, *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se*, p. 59.

說性愛可以是人與人建立關聯的方式；人在性愛中所體驗的是自我界限的消融，是與他者合而為一的經驗。然而當男性的自我是用「獨立」、「自足」、「完整」的概念來定義時，性愛時自我消融的經驗對於男性自我的維繫便形成了威脅；因此男性自我保護的方式是將自己的情慾轉化為統治的慾望，將她者視為等待被征服的客體，把性愛當作表現男性氣質的機會。³⁶因此，男性情慾與男性暴力成了一個銅板的兩面，陽具與刀槍成了可以彼此替換的隱喻。除了以上的心理解釋外，文化因素（尤其是軍隊文化）亦扮演了將男性情慾暴力化與將男性暴力情慾化的重要角色。如本文所提到Louis Montrose的研究，新大陸被比喻為處女，鼓勵男性帝國主義者入侵。當性別階層的意識形態合法化了英國人想要侵佔新世界女體的集體欲望時，佔領他人土地的帝國意志也回過頭來強化了男性視女性為她者的觀點，視女體為等待被「入侵」、「佔有」的客體，並視自己為主動、入侵、具有控制權的男性主體。

回到〈小寡婦〉的故事，當路易求助於醫生時，醫生建議他找一個具有專業技巧又對他有情感的女人做愛，這或許可以排除他心中的陰影。「情感」的作用正是使男女的性行為回到人與人互相關聯的模式，而不再服膺一方統治另一方的男性性愛邏輯。路易的太太自然是最佳人選，但卻遠在美國本土；而在台灣，小寡婦酒吧的妓女們，的確為來台的美軍扮演了妻子般的角色，甚至可說是心理治療師。湯姆和比利，兩個不超過20歲的娃娃兵，卻有著難言的心理創傷。他們因為殺了32名越共得到來台度假的權利，但下意識裡知道自己所殺的可能只是一般的老百姓（頁186-187）；湯姆甚至開槍殺了在他面前意圖逃兵的朋友荷西，也難怪要服用迷幻藥，以逃避戰爭所帶來的心理創傷（頁201-202）。妓女菲菲細心地照顧睡著了的比利，用毛巾仔細地替他擦臉，並在隔天為他在寺廟求了護身符。後來湯姆戰死，比利失去一支手臂後退役了；比利沒有回美國，卻立刻來台灣找菲菲。故事結

36 Timothy Beneke, *Proving Manhood: Reflections on Men and Sex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 97-98.

束在比利與菲菲一起回到她的住處，似乎暗示來台美軍與台灣妓女「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一段異國情緣。論者或謂這樣的結尾使小說無可避免地染上「極度濫情的色彩」，³⁷但從人性的角度來看，黃春明表現了超越種族的同情心與人道主義精神，而且點出具有感情的性愛或許可以轉化男性暴力與治愈戰爭的心理創傷。

〈小寡婦〉無疑是一篇批評美帝的後殖民小說，但同時也呈現出殖民主義的複雜與矛盾。美帝的侵略下似乎也有得利者——姑且不論美國因為韓戰與越戰而不得不重視台灣的戰略地位，確保了台灣的安全，至少美軍在台的消費對下層階級有最直接的助益，正如阿青所說：「你們（美國）不打越戰，叫我們（台灣妓女）喝西北風？」（頁121）。而受害者不只是戰場上無辜被殺的越南人民，還包括帝國主義的步兵、戰場上的劊子手、反戰但不得不參戰的美國士兵，如比利、湯姆及荷西。受害者也有像阿青一樣的妓女，歷經兩任美國同居男友，卻無法實現她的美國夢，還留下了「紀念品」小黑：一個台美聯姻、黃黑混血的小孩，不會說英語，只會製造麻煩。美國帝國主義不只在台灣創造混種（hybrid）的情境，也為自己創造了矛盾。正如菲菲最後對比利所說的「越戰越打，我們小寡婦也越來越多」，這一句話可說是一語雙關：在台灣越來越多的妓女加入「小寡婦」酒吧，裝模作樣地扮演中國小寡婦海削美軍的錢；但當參戰的年輕男人不幸戰死沙場，也將有越來越多的小寡婦在越南與美國本土出現——戰爭的傷害與帝國主義的矛盾莫此為甚。

最後，李永平《海東青》中〈一爐春火〉一章描述一個宴會場景，但一席下來，與會的教授們一方面思春、意淫、開黃腔、以日本女孩作為口頭宣淫的對象，另一方面又念念不忘南京大屠殺的往事與日本人來台嫖妓的羞辱。此章節至少在兩個地方與黃春明的〈莎啞娜啦·再見〉有互文的關係。首先是李永平本身的大中國民族主義，視蔣中正為渡海來台的摩西，視台灣為中國的縮影，視來台買春的日本嫖客為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本兵的借屍還

37 高全之，《從張愛玲到林懷民》（台北：三民書局，1998.02），頁213。

魂，³⁸此一中國民族主義與〈莎喲娜啦・再見〉中的主角黃君遙相呼應：黃君在面對來台嫖妓的日本商人時，同樣召喚了南京大屠殺的記憶，表達了自己的民族意識。就這一點來看〈一爐春火〉雖然不是標準的後殖民文本，但隱含了反殖民的意味。其次，或許是對黃君的國族意識有所共鳴，李永平借著故事中陳教授的口說道：「日本尋芳客組團專程來我們這寶島買春……沿著中山高速公路從北殺到南……還搞個千人斬俱樂部，此生誓殺一千個中國女人才封刀！有篇小說就講這個」（頁698），其中的「有篇小說」正是黃春明的〈莎喲娜啦・再見〉。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地視〈莎喲娜啦・再見〉為〈一爐春火〉的潛文本（subtext）；在閱讀〈一爐春火〉的過程中，讀者對〈莎喲娜啦・再見〉的記憶不斷被召喚，也使兩篇小說有對話與辯證的關係。本小節將集中討論〈一爐春火〉中女性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所扮演的曖昧角色，以及去殖民的國族主義常常不智地複製了殖民主義性別暴力的現象。

如果〈一爐春火〉所要控訴的是「中國女性（或女孩）的悲慘命運」，則王德威指出小說中的矛盾：「日本軍人嫖客奸淫我們的少女，我們是否就有權非禮日本少女？我們又如何面對中國嫖客蹂躪中國女孩的事實？教授把幼齒『學問』化、『專業化』，又該當何罪？」³⁹當陳教授提及日本尋芳客專程來台買春，誓殺一千個中國女人才封刀時，另一位廖教授的評語是「刀下幽魂，知多少」，而謝教授也附和：「好個刀下芳魂，既淒絕也美極」（頁698）。廖謝兩人的評語不但不是表達對女性同胞受辱的憤怒，而是將日人嫖妓的行為詩化或美學化，並流露出艷羨的語氣，彷彿在感嘆從事千人斬的人為何不是自己。如果日本人的武士刀可以視作永不衰萎的「假陽具」，則台灣男人與日本人同樣表現了對刺入女體的慾望與對假陽具的崇拜。或許李永平原意在表達其中國民族主義，並藉由日人嫖妓的事實來引起

38 李永平，〈出埃及第四十年——《海東青》序〉，《海東青：台北的一則寓言》（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2），頁1-5。

39 王德威，《眾聲喧嘩以後》（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1.10），頁103。

反日的情緒，但當書寫開始後，故事所揭示的卻是台灣男人與日本男人的共謀、競爭、甚至彼此認同的關係。

全章的高潮發生在教授們酒酣耳熱之際，幻想自己是日本色情電影的導演，討論要脫哪一位日本女星的衣服；當日本人與台灣人同為色情影片的消費者時，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對立在男性性幻想中消弭於無形，達成了台日大和解。教授們首先稱讚日本和服的設計，使男人得以「抓住腰帶的頭，一扯！女人整個身子就如陀螺似的一圈一圈滴溜溜滴溜溜兜轉了開來」（頁735）。不論台灣男人或日本男人都將女性視之為慾望的客體（object of desire），並表現了男性對女性的控制慾望：男人是操控者，以男性的力量（暴力？）剝除女性的防衛（和服）；女人毫無主體性可言，如同陀螺一般不由自主地旋轉。此一征服控制的慾望似乎是不分國籍與種族，而是如學者所言，控制女人、控制其他男人、控制自己的身體，諸如此類的控制慾望根本就是男性氣質的重要組成。⁴⁰

當這群教授將自己想像成色情影片的導演，得以對自己仰慕的女星為所欲為時，此一控制慾尤其表現在對女性暴力脅迫的想像情節中：這些日本女星不是高校少女「慘遭流氓結伙輪番蹂躪」（頁754），就是家庭主婦「遭受六個破門而入、獐頭鼠目……的日本流氓挾持」（頁768）。一方面，這些女性被想像為聖女、處子或具有某種不可被輕侮、意淫的特質（如高校少女與家庭主婦身份所隱含的）；另一方面，男性強暴、凌虐女性的性幻想在教授們的言談中昭然可見。這樣弔詭的性幻想，混合了虐待狂與對女性的理想化，或許Michael S. Kimmel的理論可以提供一個解釋。⁴¹他認為男性文化鼓勵男人表現出對女人的慾望，並視「佔有」女性的身體為男性氣質的憑證，然而性壓抑的文化又教導女人對男人說：「不」，而使男性在尋求性滿足時，常常遭受挫折，因而衍生出對女人的憎恨。在這個心理脈絡下，色情

40 Lynne Segal, *Slow Motion: Changing Masculinities, Changing Men* (London: Virago, 1990), p. 123.

41 Michael S. Kimmel, *The Gender of Desire: Essays on Male Sexualit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pp. 84-86.

影片為現實中挫敗的男性提供一個想像的替代滿足：一方面，男人在色情影片中通常有求必應，可以為所欲為，例如〈一爐春火〉中的教授們就幻想著可蘭經中的第七天國，在哪兒男人興之所至無論晝夜都可以和天上任何一位少女隨意交歡（頁717）；另一方面，影片中男性對女性的暴力，正是男性在現實中遭到女性拒絕所累積的憤怒，在想像的領域裡對女性加以發洩與報復的癥候。如果在前一個層面，重點是慾望的滿足與生理愉悅的追求，則在後一個層面，攸關的是男性的挫折與無力感——藉由對女性施暴，男人重新肯定那因為被拒絕而挫傷的男性氣質，重新肯定自己無所不能、無事不在掌控中的理想男性形象。如果色情影片的功能之一，是讓男人重新修復被挫傷的男性氣質，那麼征服「處子」、「聖女」或任何一種不輕易屈從的貞節女子，自然要比與妓女交歡更能肯定自己作為男人的能力。不管是台灣人或日本人，只要是色情影片的觀眾，大約都表現了上述的男性潛意識，成了在想像層次上的女性施暴者。

不可否認的，故事中的教授作為女性情色的消費者，與日本人有某種程度上的認同關係，例如當宗教授談及日本商人下部進曾在床第之上賞鑒過日本女星五月夏江時，下部進宛如是宗教授的分身，為他執行現實中的不可能任務（頁762）。然而，這些教授身為被殖民的台灣人，在不斷地召喚南京大屠殺記憶的同時，也對殖民女人（日本女人）表現出男性的慾望，並在其中混合了被殖民者的心結。在故事中，教授們有一段對話談到日本政府的電檢制度，規定日本色情影片中女人的第三點都必須打上馬賽克。當幾位教授抱怨此一作法大殺風景時，有人指出台灣業者已經研發出解碼片，「突破日本人的第三點」，「國人得以大吃日本女人的冰淇淋」，而「日本男人反倒無福消受」（頁716）。「突破日本人的第三點」明確地挪用了戰爭的語彙，在稍後的修訂版中，被改寫為「第三點防線」，⁴²更是明明白白將入侵日本女體視為一場戰爭，使其中的暴力意涵昭然可見。教授們意圖剝掉日

42 李永平，〈一爐春火〉，《李永平自選集（1968-2002）》（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3.08），頁263。

本女人的和服，以及突破日本人的馬賽克防線的意淫，不禁使人想起 Frantz Fanon 所提到的法國（男性）殖民者意圖揭開阿爾及利亞（女人）面紗的修辭——除了以現代化殖民地為藉口的殖民意圖外，還混合了男性殖民者對異國女性的窺淫慾望。⁴³ 從李永平的小說中，我們可以清楚看見作為被殖民者的台灣男人，似乎不智地複製了殖民者侵入土地／女體的暴力模式與情色慾望，只是對象轉換成屬於殖民者族群中的女性。

李永平筆下的教授們意圖侵入日本人設下的「馬賽克」防線，除了男性對女性的征服慾以外，也未必沒有殖民主義抗爭者的報復心態，以及隨之而來的報復快感。在討論到男性氣質與國族主義的關聯時，Cynthia Enloe 認為：「國族主義通常起源於男性化（masculinized）的記憶、男性化的羞辱與男性化的希望。對被非男性化（emasculated）的憤怒……通常被轉化成燃起國族主義運動烈火的燃料」。⁴⁴ 在地女人被外來殖民者侵犯的記憶，正足以召喚在地男性同仇敵愾的國族意識，其中隱含的以暴治暴的邏輯——儼然是殖民者男性暴力的翻版——似乎並不使人意外。Fanon 就認為被殖民者選擇以暴治暴具有心理上的必然性：「在個人層次，暴力是一種淨化的力量（cleansing force）。它讓在地住民（被殖民者）從自卑情結、沮喪與喪失能動性（inaction）中解放出來；它使他不再恐懼並重獲自尊」。⁴⁵ 從男性氣質的角度來詮釋 Fanon 的話，我們可以說當殖民者女性化被殖民男人，並將之象徵性地閹割後，被殖民男人唯有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才能重振雄風，再次重獲男性自尊。其次，對殖民者中的女性（如日本女人）意淫與施暴，不失為國族主義者報復男性殖民者的手段。在討論印度的去殖民抗爭時，Krishnaswamy 就指出印度國族主義就曾經以「玷污」（dishonor）英國女

43 Frantz Fanon, *A Dying Colonialism*, trans. Haakon Chevalier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5), p. 42.

44 Cynthia Enloe, *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 44.

45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 Constance Farringto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5), p. 94.

人為號召，以白人女體作為激勵國族主義的場域。⁴⁶ 所以當李永平寫到「國人得以大吃日本女人的冰淇淋」，而「日本男人反倒無福消受」時，其中並不令人意外地流露出一種男性優越感（來自於自卑？），並反襯出日本男人的無能為力；當日本嫖客來台從事千人斬時，台灣男人則透過解碼器，突破日人防線，「大吃日本女人的冰淇淋」，這也未嘗不是一種反殖民的報復方式。至少日本男人因此淪為無法保護自己女同胞的去勢男性，而此一想像，或許正可以為台灣男人受挫的男性氣質提供一點心理補償。古典殖民主義者以武力佔領土地並剝削其資源的行為，在性別的想像中，被等同於男性擁有女體並使之受孕；〈莎喲娜啦·再見〉中的7名日本嫖客則以其經濟力入侵台灣女性的身體，作為古典殖民慾望的替代性滿足。〈一爐春火〉中的教授，似乎以觀看日本色情影片，意淫日本女性，作為反殖民的象徵替代；但反諷的是，此一替代性的報復手段卻流露出一個台灣男人在現實中的無能，以及其男性氣質挫傷的傷口仍然在隱隱作痛，尚未痊癒的事實。

五、結論：去殖民與去男性氣質

在《後殖民及其外》一書中，邱貴芬引述其他女性主義學者的話，寫道「被殖民者＝女人」（將被殖民者化為女人）的論述方法或隱喻，「混淆不同脈絡的壓迫……視性別壓迫為所有壓迫關係的典範，淡化了其他壓迫結構的特殊性，也因此而產生不少缺乏對特殊歷史情境深入了解的謬誤解釋」。⁴⁷ 要避免這樣的謬誤，除了深入歷史情境加以了解之外，就文學批評的框架而言，了解「壓迫結構」乃是由多重層面所組成的權力關係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步。以〈莎喲娜啦·再見〉中的黃君與妓女的關係為例，壓迫結構的討論至少必須包含國族、階級與性別。在國族想像的層次，黃君身為男人無法保護女同胞，他的男性氣質不免受挫，成為被閹割的被殖民男人。但黃君所受到的直接壓迫並非來自殖民者，而是無形的經濟壓力，是階級剝削

46 Revathi Krishnaswamy, *Effeminism: The Economy of Colonial Desire*, p. 50.

47 邱貴芬，《後殖民及其外》（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3.09），頁279。

逼迫他從事拉皮條的工作，至於所要討好的對象是不是日本人並非關鍵。矛盾的是殖民者日本嫖客與被殖民者黃君，同樣表現出跨種族性幻想，同樣視女人為慾望客體，同樣具有男性潛意識的假陽具艷羨，也因此男性情慾上具有某種程度的相互認同。藉由拒絕召妓，黃君否認自己與日本人的相同之處；矛盾的是，黃君越是拒絕與壓抑越是凸顯了與殖民者同樣身為男性的身份，同樣為男性文化所制約的事實。

《美人圖》幾乎是亦步亦趨地複寫了〈莎啞娜啦·再見〉中的拉皮條情節，然而國族想像中的敵我對立並未在小郭的心裡出現，反倒是文化殖民與階級剝削成了小說的核心問題。一方面，美國的流行趨勢成了小郭生活的唯一參考坐標，美式的消費主義成了小郭的最終人生意義，點出美國對台灣文化殖民的嚴重性；另一方面，小郭依循資本主義的市場原則，固然幫助了底下的妓女「海削」日本觀光客，但也可以為了金錢出賣自己的身體：對小郭而言，其經濟上的剝削者不必然是外來的殖民者，而是同樣身為台灣人的上層階級人士，如故事中的旅行社副理，他的上司。小郭本是具有陽剛氣質的男人，卻為了金錢將自我女性化，占據了一個類似女性的主體位置，成了在經濟壓迫下自我閹割的台灣人典型。然而Judith Butler在《身體攸關：論性的論述侷限》（*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一書中認為，即便「性別」（gender）或甚至「性」（sexuality）本身是文化所建構的，也因此是流動的、不穩定的、可以加以改變的，但性別主體並非可以隨心所欲地變男變女變變變；社會環境、文化論述與身體本身的物質性（materiality）限制了主體轉換的程度與可能性。⁴⁸換言之，被閹割的男人還是男人，而非女人，如同〈莎啞娜啦·再見〉中的黃君，雖然因為無法保護自己的女同胞（妓女），而遭受象徵性的閹割，但他的跨種族性幻想、對女體的慾望、對堅硬的陽具的渴望在在使他與殖民者有許多「心有戚戚焉」的時刻。

48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p. 9-10.

如前所述，〈一爐春火〉以〈莎喲娜啦・再見〉為潛文本，時時召喚南京大屠殺的記憶與日人來台嫖妓的現實，似乎是要引發讀者反日的國族意識，然而整篇小說卻揭露出被殖民男人與殖民者之間曖昧的艷羨、認同與競爭的關係。首先，不論日本或台灣的男性文化，均鼓勵男人慾望女體，鼓勵男人視女人為等待被征服的客體，鼓勵男人以佔有女性的身體為榮，而且多多益善。男人在追求性滿足上的挫敗，常常導致男性的厭女情結，情結嚴重者甚至訴諸於強暴以重新肯定自己受創的男性氣質。對女體的慾望與憎恨，很容易就被反殖民運動移花接木，例如意淫或強暴殖民者族群中的女性，成了燃燒國族主義火炬的燃料，成了被殖民男人報復殖民者的手段，成了被閹割男性重新建立起男性自尊的方法。另一方面，殖民主義隱含（男性）暴力，而暴力常常引發更多的暴力，而使自己身受其害，如越戰不但使越南陷入戰亂，也使美國受到重創。黃春明的〈莎喲娜啦・再見〉與〈小寡婦〉從個人的心理層面切入，分別點出了日本與美國士兵在對被殖民者施暴後，所必須面對的良心譴責與戰爭的心理創傷。當殖民者認知到軍事入侵與暴力殖民、來台嫖妓與刺入女陰具有同樣的暴力本質時，自我必須啟動防衛機制以面對道德焦慮；此時，殖民者不是自行閹割了男性慾望，就是以「退化」的機制以逃避現實。在黃春明筆下，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不再是簡單的善與惡的二元對立，至少帝國主義下的低階步兵（儘管無法否認其施暴的事實），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男性暴力的受害者之一。

綜合以上的討論，男性氣質與反殖民的國族主義具有多層次的關係。首先，被殖民男人常常以本土女性所受的羞辱作為激起國族主義的手段。在殖民主義者的「女性化主義」論述下，被殖民男人成了無法保護自己女人的去勢男性，而此一男性恥辱，成了被殖民男人以暴力重振男性雄風的心理根源。被殖民男人除了對殖民者以暴治暴，重新肯定自己的男性氣質外，也可能將報復的衝動發洩在殖民者女性（如日本女人）身上，並混合了男人對女人的慾望與恨意。其次，反殖民的國族抗爭常常以男性文化為礎石，崇尚武力、勇氣、抗爭、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報復邏輯，因此殖民暴力引發反殖民暴力，而暴力又引發更多的暴力，如男人對女人的暴力，導致最終施暴

者也深受其害。第三，殖民與反殖民論述都將「戰爭性別化」（sexualizing war）、「性別軍事化」（militarizing sex），而使性與戰爭的論述密不可分，成了一個銅板的兩面，例如：槍成了陽具的隱喻，征服女性宛如上戰場，突破她的「防線」。在此一邏輯下，不論是殖民或被殖民女性，不可避免地成了殖民與反殖民戰爭的受害者。因此，如果我們沒有反思與批判國族主義中的男性沙文主義文化，我們如何保證在被殖民者獲得獨立，甚至擁有強大的權力時，不會變成另一波的帝國主義者？⁴⁹ 如果被殖民者亦步亦趨地複製殖民者的暴力模式，掌握權力的被殖民者又如何避免以暴治暴所帶來的人性挫傷？或許去殖民的過程與去除男性氣質中的暴力層面終將同時並進，不可偏廢。



49 陳光興指出，在帝國主義的籠罩下，被殖民者可以演化成「次帝國」，以政治與經濟的手段，入侵其他更弱小的國家，見陳光興，《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頁29-31。

參考資料

一、專書

小林善紀著，賴青松、蕭志強譯，《台灣論：新傲骨精神》（台北：前衛出版社，2001.02）。

王禎和，《美人圖》（台北：洪範書店，1982）。

王德威，《眾聲喧嘩以後》（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1.10）。

邱貴芬，《仲介台灣·女人：後殖民女性主義觀點的台灣閱讀》（台北：元尊文化企業公司，1997.09）。

———，《後殖民及其外》（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3.09）。

李永平，《海東青：台北的一則寓言》（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2）。

———，《李永平自選集（1968-2002）》（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3.08）。

高全之，《從張愛玲到林懷民》（台北：三民書局，1998.02）。

陳光興，《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台北：行人出版社，2006.10）。

陳儒修，羅頗誠譯，《台灣新電影的歷史文化經驗》（台北：萬象圖書公司，1994）。

賀安慰，《台灣當代短篇小說中的女性描寫》（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

黃春明，《莎喲娜啦·再見》（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1985）。

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5.07）。

Beneke, Timonthy. *Proving Manhood: Reflection on Men and Sex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Bordo, Susan. *Twilight Zones: The Hidden Life of Cultural Images from Plato to O.J.*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 *The Male Body: A New Look at Men in Public and in Privat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9.

Butler, Judith.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Chan, Jachinson. *Chinese American Masculinities from Fu Manchu to Bruce Lee*.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Enloe, Cynthia. *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Fanon, Frantz.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lated by Constance Farringto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5.
- , *A Dying Colonialism*. Translated by Haakon Chevalier.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5.
- Freud, Ann. *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se*. Translated by Cecil Baine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INC., 1946.
- Genette, Gerard. *Palimpsests: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Degree*. Translated by Channa Newman and Claude Doubinsk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7.
- Gilmore, David D. *Manhood in the Making: Cultural Concepts of Masculin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Jeffords, Susan. "The Big Switch: Hollywood Masculinity in the Nineties." In *Film Theory Goes to the Movies*. Edited by Jim Collins, Hilary Radner, and Ava Preacher Collins. 196-208.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 Krishnaswamy, Revathi. *Effeminism: The Economy of Colonial Desire*.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 Kimmel, Michael S. *The Gender of Desire: Essays on Male Sexualit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 McClintock, Anne. *Imperial Leather: Rac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Colonial Contest*.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Segal, Lynne. *Slow Motion Changing Masculinities, Changing Men*. London: Virago, 1990.
- Teng, Emma Jinhua.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Williams, Raymond.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Rev.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Wood, Ellen Meiksins. *Capital of Empire*. London: Verso, 2005.

二、論文

- Montrose, Louis. "The Work of Gender in the Discourse of Discovery." *Representation* 33 (Winter 1991): 1-41.